

亟待繁荣国防经济学:来自军民融合实践的呼唤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军民融合的实践已经在国家战略中不断深入。不可否认,我国军民融合的理论研究与战略决策,国防经济学界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国防经济学人的理论智慧和学术贡献发挥了重大作用。从中国梦和强军梦的未来看,军民融合要取得实践上的成功,迫切需要国防经济学的繁荣和理论支撑。

军民融合的实践呼唤广大经济学家研究国防经济学。当前,军民融合的许多理论智慧都来自军队系统的国防经济学家,军民融合的许多理论探索也由军队系统的国防经济学家承担。实际上,军民融合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总结,都需要广大经济学家群体的参与,需要众多的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特别是需要国内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给予关心并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给予思考。没有地方经济学界和军队系统国防经济学界的“军民融合”,我们的军民融合

实践及赖以支撑的国防经济理论就取得新突破。在广大经济学家的重视和参与下,必然会引领更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把“国防经济”作为自己的学术自觉,推动国防经济学在更广的领域和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军民融合的实践呼唤广大高校要增设国防经济学的专业。国防经济学是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动高校新增国防经济学专业,特别是经济管理类院校,都应该设置国防经济学专业课程。军民融合不仅是“军”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民”,“民”是“军”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民”,军民融合的实践无法进行。自然,国防经济学也就不仅仅是“军”的事情,更是地方高校必须设置的重要课程。目前,在地方高校中,专业设置的国防经济学教育的只有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少数高校。我们的大多数高校

还没有开设国防经济学课程。高校要适应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培养军民融合新型人才,必须尽快开设国防经济学专业课程,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做大做强国防经济学专业,培养国防经济高级专业人才,走联合办学的路子,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探索出“国防经济”的军民融合新路径。

军民融合的实践呼唤学术媒体多刊发国防经济学论文。学术媒体是引领学术方向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学术交流和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传播阵地。国防经济学的繁荣必须依托学术媒体,必须得到学术媒体的强力支持。现在,我们的许多重要学术媒体因涉“密”问题不愿意刊发国防经济理论文章,加之关心国防经济的读者不多,久而久之形成不良循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的学术媒体要向国防经济学界适度倾斜,有重点地开设国防经济专栏,有目的地多向国防经济学人约稿。

国防经济学不是小学科,它涉及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地理学、史学、国际关系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是所有经济学二级学科中出成果最难、最耗精力的。因此,我们要把国防经济学看成“大国防经济学”,需要学术媒体的助力和学术引领,吸引更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投身国防经济学。

国防经济学的实践呼唤地方智库必须补齐国防理论人才短板。像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家级智库也没有专业的国防经济学人才,地方智库在这方面也是空白。现在,中央有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这样的领导机构,省级党委也都有军民融合领导小组。同时,军民融合产业园区、军民融合示范基地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需要在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中融入“军民融合”的新内容,面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现象,需要提出区域军民融合的新思路新政策,

需要智库给予强有力的智慧支持。但我们注意到,地方智库在这方面显得力所不及,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国防经济学人才。为了军民融合战略的顺利推进,地方智库要加快配置国防经济学人才,使之成为地方智库的标配。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经在媒体撰文呼吁:不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国防经济学就不完整,经济学家只能算半个经济学家。现在,我们的国防经济学还弱小,尚未在高校普及,人才匮乏,研究机构也不多。在今天军民融合的背景下,我还要呼吁,希望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重视这个大有作为的阵地,要把研究国防经济学作为服务国防建设的自觉责任和历史担当,为推动和繁荣国防经济学理论,为推进军民融合的发展,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贡献自己的学术智慧。

▶▶▶ [上接 A2 版]

金融开放的成就、不足与变革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任泽平

韩国金融开放的启示:(1)稳健、有序的放开资本账户,尤其注意先长期后短期的时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资本交易活动限制。(2)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实现资本账户稳步开放的前提,若存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维护汇率波动区间,易导致短期资本投机,在市场预期与官方定价差别中投机和套利,引发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风险。(3)协调有序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措施、加强统一和独立的监管,避免积聚风险。

80—90年代的韩国宏观经济与我国现阶段相似,一是经济增速均出现换挡,二是经济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是金融对外开放进程加快。我国金融开放,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加快国内经济及金融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及利率市场化进程,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三、我国金融开放的特点与现状

3.1 金融开放成绩赫然,未来空间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为1978到2001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金融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阶段二为2001年至加入WTO以后,金融开放不再以吸引外资为重点,开始将“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大幅提升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融开放以来,由于其本质即竞争性行业,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外资,加强行业内竞争,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及风控能力。如国内无抵押信用贷款、村镇银行等业务,均由外资银行引入。而外资金融企业产权及公司治理经验,同样明显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水平。金融开放后,已通过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通道式”机制开放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开放程度更高,已完全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进行投资。资本项目相关方面,我国利率市场化已于2015年底在政策层面完成,汇率弹性及灵活性不断提升,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截止2016年末,中国达到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已有37项,不可兑换项目仅剩非居民境内发行股票、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品业务等三项。

然而整体来看,我国当前金融开放水平仍不足,与我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匹配。具体来看:

(1)汇率、利率制度改革卓有成效,但汇率形成机制不够灵活、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仍

存在

我国汇率形成机制从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多次调整。在金融危机时期采用事实上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稳定经济,在正常时期探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1994年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轨以来,不断尝试浮动汇率形成机制,2005年后正式进入探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阶段。但一旦汇率出现较大变化,货币当局担忧汇率过度波动,会采取措施消除震荡,影响汇率反映市场的真实性,如2010—2013年面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2014—2016年出现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央行均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汇率缺乏足够的弹性,一方面影响货币当局制定政策的独立客观性,另一方面,也给国际投机资本创造套利空间。

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跟进。在2004年之前探索实现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2013年7月放开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10月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至此我国存贷款利率上限均已放开,利率市场化政策上基本完成。但实际中仍然存在行业协会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影响利率传导。

(2)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但仍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

2002年中共十六大决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和鼓励各类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资本账户开放开始提速。资本项目总体遵循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先试点后扩展的顺序逐步放开管制,主要包括直接投资项逐步实现基本可兑换,间接投资通过QFII、QDII、沪港通、深港通等管道方式放开。2016年,人民币不可兑换项目仅剩非居民境内发行股票、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品业务等三项。尽管如此,相比于发达经济体,甚至是很新经济体,我国的开放程度仍处在较低水平。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进入2009年后,为匹配危机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需求的增长,包括人民币离岸市场、双边本币互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各项制度安排提上日程。截至2017年末,我国已与36家境外央行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协议,CIPS直接参与者为31家,间接参与者为745家。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权重达10.92%,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踏上新台阶。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度和使用度持续提升。但根据IMF官方储备币种构成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季度,人民币占比1.4%,远低于美元的62.5%、欧元的20.4%、日元的4.8%。

(3)金融体制改革开放并进,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但仍对外资限制较严

加入WTO后,银行、保险、证券分别实现入世承诺,放松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形式、地域、业务范围限制。同时,四大银行、三大保险

率先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外资,先后上市,改革与开放互相加强。截至2016年底,在华外资法人银行达39家,外资保险达57家。

但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外资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均有较限制的。国家在2018年进一步开放措施落地前,银行、证券和保险均存在严格持股比例限制,银行方面,单个境外机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外资累计持股不得超过25%;保险方面,虽然2004年初保监会取消非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但寿险公司仍存在50%持股比例限制;要求上市公司外资持股比例合计不超过25%,非上市公司合计不超过49%。此外,外资金融机构还面临业务范围和牌照发放制约。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较长,对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机构的总资产规模要求过高;外资保险面临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数量控制;外资证券机构仅限于合资形式,只能从事承销、外资经纪以及债券经纪业务等小部分业务。

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动力不强,多年来其资产占比均不足10%。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资机构出售海外资产、聚焦本土经营,同时我国加强管制,对外资银行行业,更严格,不再发放新的证券外资银行牌照,外资银行和证券机构占比进一步下降。

(4)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加,带动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发展,但开放的广度深度仍不足

债券市场开放主要体现在允许境外机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自2005年外资金融机构获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后,市场加快扩容,截至2017年5月,已有473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主要是以“管道式”机制打通资本双向流通渠道,自2002年后,先后推出的QFII、QDII、RQFII、QDLP、沪港通、QDIE、深港通等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双向互通机制,吸引更多海外参与,截至目前,双向互通机构已达287家,额度为1005亿美元;QDII机构已达152家,额度为1032亿美元。

但不同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差异较大,且尚未解决的制度安排问题严重阻碍了开放深度广度的提升。债券市场已经是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但仍有以下四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内会计、审计政策与国际标准有异;二是评级公信力缺乏;三是实行市场参与者准入备案,一级托管、集中交易的模式,与国际市场不同;四是债券可投资的外汇和衍生品数量少。股票市场开放程度次之,但目前“管道式”开放为主的模式与全面开放仍有差距。此外,与国际市场不同,我国外汇市场以实需为基础,参与者活跃度、积极性不够。

3.2 新一轮金融开放以金融服务业为抓手,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习总书记在2018年4月10日的博鳌讲话中提出,“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标志着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开始。4月11日,易纲行长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具体措施。

时间表显示我国加速开放金融服务业,金融业对外开放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具体来看,本轮金融开放将实质放开外资进入我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持股比例、经营范围、业务范围限制,引入优秀的竞争者,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沪港通、深港通和沪伦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将继续向前发展,加强“通道式”资本流动,稳妥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博鳌论坛后,各项开放措施不断落地。2018年4月以来,我国已陆续重启在2015年因跨境资本流动压力而暂停新批QDII、RQDII、QDLP等的额度,放开QFII、RQFII资金汇出限制,取消本金额定期要求。6月28日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宽到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3.3 未来金融开放展望

从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来看,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两者之间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开放次序依赖于国内实际情况。对于金融服务业,关键在于国内监管体制是否健全,国内金融机构是否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对于资本账户相关领域来说,则要协调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市场化及利率市场化。开放也并非一放了之,而是在完善审慎监管、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稳步有序开放,以改革助开放,开放促改革。

(一)加快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以开放促竞争

金融业对外开放要加快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近年来,随着国内金融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各项行业监管政策不断完善,有效打击过去金融乱象及金融套利空间,金融服务业开放基础不断扎实。此次央行公布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业开放,并给出了一个清晰时间表,有助于未来金融

服务业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金融行业在时间表内积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创新能力,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能“啃最难的骨头”,培育竞争优势。

(二)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

资本项目开放需政策配合、审慎推进。一般认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是资本项目全面开放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可以有效缓冲资本出现大幅波动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在“固定汇率+资本开放”组合下,央行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应该大幅滞后于资本项目开放及汇率制度改革,谨防出现日本式经济泡沫。未来仍需谨慎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谨防部分领域开放过快而相关配套机制没有跟上,从而影响金融稳定。但需防止由于机制协调困难而出现的改革惰性,积极把握时机,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双管齐下,稳步推进时,在开放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持续开放。

(三)金融开放并非一放了之,需持续完善审慎监管框架,加快推进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

持续完善审慎监管体制,重点在于宏观审慎监管及跨行业监管,以及金融机构相关制度健全。金融开放并非一放了之,在制度层面,一方面需配合宏观审慎监管、监管机构协调,防止风险跨行业传染。随着我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水平持续提升,有助于未来在开放的基础上深化改革,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需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强化“三会一层”内部控制机制运行,明确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管理边界,及时有效的控制风险。推动会计、审计、税收、法律制度完善,减少境外参与方额外成本。

持续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防止金融开放放大国内结构扭曲。韩国金融开放的验证,在国内金融结构扭曲的背景下,金融开放会进一步恶化国内结构扭曲现状。魏尚进(2018)指出,当一国还未开放时,如果金融制度已在资源配置上存在很多扭曲,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或中央银行把金融资源投放到效率相对较低的行业或企业,而效率高的经济主体反而拿不到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国外资本流入后,通过国内金融体系反而会使国内资本配置的扭曲进一步放大。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仍较为明显,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债券市场评级体系及结构仍有待改善,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银行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挤压小微实体经济空间。随着我国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需进一步加快我国结构性改革步伐,积极培养经济增长新动能,以改革促进开放,更要以开放促进改革,保持经济结构合理发展,防止金融扭曲进一步放大。(完)

▶▶▶ [上接 A1 版]

罗默的“内生增长论”及其局限

一个有诺奖级创意理论的大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提出如此失败的创意?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新古典主义和有强烈新古典色彩的制度主义增长理论,潜意识里都认为只要有了一个充满公式和模型的菜谱,就能够西式机械化地烹饪出一道美味佳肴。可惜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现实的解读,就如同青春期的恋人对待恋爱对象那样充满了自我幻觉。新古典增长理论本来就是一种可以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社会工程学,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才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成了可以不顾公共选择背景的社会工程师。可如果配角性质的经济政策顾问膨胀成经济增长工程的操盘手,一个经济学家就会在升腾为上帝的同时陷入自我幻觉。

罗默曾经激烈批评同时代中的数学误用和滥用,认为误用导致了滥用,人们对枯燥推

导过程的冷漠又加剧了滥用。可实际上,即便经济学用对了数学也会有滥用,人们的冷漠也只不过是显示过分数学化的参照型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上的局限而已。更明确地说,作为通过远离现实来把握现实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理论本来就无法避免数学滥用,不是数学家的经济学也无法可能不滥用数学(且不去说数学包装的潜规则);新古典理论也只有用数学化的理论模型来压倒现实化的理论模型,才可能实现“低因果密度的模型”对“高因果密度的现实”的把握。所以,用正确的数学把现实的真问题掩盖掉,这才是真正的数学误用和滥用。这意味着说,在新古典思维的支配下,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的认知不是一个“是否有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把参照型理论转化为解释型理论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2015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学规则》里说:“不要被数学吓到。经济学家运用数学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其实,构建数学化的参照型理论和构建现实化的解释型理论是不同的聪明,因参照型理论的思路,而把参照型理论当成解释型理论来用,那才是真的不够聪明。

对接受“非洲穷国测试”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困难的并不在于认为某个因素“也重要”,而在于逻辑地协调自己认为重要的各个因素,或者在各有理的情况下逻辑地协调自己和他人认为重要的各个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罗默的获奖理论“知识-教育-技术”与后续理论“创意-制度-人口”显然无法得到自我协调。例如,前者强调人力资本,后者强调制度创

新,这就涉及人力资本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协调问题;另外,前者强调人口质量,后者强调人口数量,这也涉及到哪个因素更重要的问题;而如果因此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重要,那么,这种大杂烩式的综合,要么就可能像盖勒的“一面增长论”那样无法成功,要么就会因为全面俱到而完全取消理论。

迄今为止,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仍然无法解决各个重大因素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当然也是不同理论依然各自自说,并因多元竞争的假象而让人心安理得的原因。可是,逻辑协调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彻底性和现实迫切性的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从奥派理论或历史经验去批评罗默,但批评总是相对容易的,重要的却是拿出更有解释力的替代理论。(完)